

◎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 ◎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老学者文集

郑成宏 / 编

ZHONGGUO SHEHUI KEXUE ZAZHISHE  
LAOXUEZHE WENJI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 ◎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老学者文集

郑成宏 / 编

ZHONGGUO SHEHUI KEXUE ZAZHISHE  
LAOXUEZHE WENJI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老学者文集 / 郑成宏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 - 7 - 5004 - 9637 - 3

I. ①中… II. ①郑…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4602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蓝垂华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28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序

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建社三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1月创刊）迎来创刊三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1日创刊）创刊一周年的特殊日子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诸同仁精选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汇集成这套《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出版了。这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科研人员呈现给自己单位的一份深情厚礼。

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始终坚持“编研结合”的方针，要求编辑人员结合自己的编辑工作，认真研究理论和学术问题，既要密切跟踪国内外学术前沿，又要准确把握本学科的学术历史；既要关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又要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努力形成自己的研究理念、研究风格和独到见解。正是浓厚的学术氛围、严谨的学术风气、深厚的学术积淀，使杂志社不同于一般的编辑机构，它拥有一支具有较深理论造诣和学术积累的科研队伍，推出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的学术报刊，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学术水平，在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洪流中，占有醒目而且重要的位置。

最近几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的关心和领导下，进一步加强对理论学术前沿的研究和引领，率先在全国期刊界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编辑室，建立了理论前沿研究中心，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份全国性哲学社会科学专业报纸《中国社会科学报》，完善采、编、发流程管理，大力实施“开门办刊”和“开门办报”方针，更加强调“编研一体化”，努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专家型编辑、记者，努力为推动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学术话语体系作出更大贡献。这套学术文库，可以说是对杂志社编研结合办社方针成果的一次检阅。

尽管这部学术文库所收论著，既有离退休老同志的论文辑录，也有在职同志的自选集，还有青年同志的学术专论，但毕竟只是部分同仁的科研成果，未必代表杂志社工作人员的最高学术水平。当然，从其所涉领域、研究理路、学术风格中，人们能或多或少地体会到杂志社独特的学术视野和科研特色。

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充满挑战、异常艰辛的工作。在这里，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坚强的意志，没有经受挫折、百折不回的精神，是不可能做出任何重要成绩的。好在中国学术，具有源远流长的优秀学术传统，无论是从事编辑工作，还是从事科研工作，只要认真反思、体会、继承这些优秀传统，就能够获得一些重要的教益。

一是求是的传统，也就是追求真理、探索规律的传统。真正的学问家，从来都将认识人类之命运作为自己全部学术活动的出发点，力图通过对社会关系、社会形态的反思，通过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反思，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结论，即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事实上，高层次的学术活动，不但是严谨的，而且是思辨性的，充满了理性的睿智。

二是求真的传统。学术研究，就其直接目的而言，就是揭示和研究人类活动的各种形态。这决定了它必须将具体的事实作为自己学术立论的重要基础。明儒王阳明曾提出“五经亦史”的重要论断，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其言未必准确，但反映了中国学术注重事实、不空言义理的重要传统。学术的科学性，首先取决于研究者是不是在依靠事实说话。事实的论证，要永远重于空洞的说教。

三是经世的传统。这就是主张学术研究要服务国家，服务民族，做到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经世不但是研究目的，而且是一种道德，一种精神，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学问回报社会的高尚情操和庄严责任感。在中国传统社会，学术从来都以经世为其基本目的。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一文中，明确阐述了自己以史经世的学术主张：“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这就是说，注意人伦日用，关注时代需要，是章学诚治史的重要特征，也

是其以史经世的基本内容。正是经世的传统使史学在中国历代社会与政治变革中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

环顾当今学林，中学与西学互动，传统与现代并存。然而，我们民族悠久、深远的优秀学术传统，仍是我们前进的基础和出发点，是不可或缺的智慧宝库。学术研究如果不以求是为目的，如果不关注、不探索社会演变的规律，以烦琐考证取代理论思维，以堆砌资料为博，以叠床架屋为精，拾芝麻以为玃珠，袭陈言而自诩多闻，以偏赅全，见小遗大，学术就注定要丧失自己应有的精神境界，在由无数具体事实堆积而成的汪洋大海中迷失方向。一旦如此，其着力逾多，其离科学精神所追求的境界愈远。但另一方面，如果缺乏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缺乏对规范的必要尊重，脱离实际，游谈无根，空言“义理”，或以一偏之见为理，或以望文生义为理，或以自逞胸臆、杜撰“体系”为理，或以拾洋人、权威牙慧为理，学术也会丧失自己的精神境界，堕落为“玄学”。就学术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如果缺乏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学术研究与服务现实简单对立，学术将不但会丧失发展的余地，而且也会逐渐丧失生存的空间。反之，如果将经世致用简单化、庸俗化，用应时之作取代理性而严谨的科学探索，学术就会堕落为“俗学”，也谈不上起码的尊严。

当代中国正面临着极其宝贵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当代中国学术也是如此。如何立基，何去何从，是每一个治学者都不能不面对的重大问题，岂可不深思而慎择之。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付梓之际，潦草数言，权充书序。

高翔

2010年4月于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院

# 目 录

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	朱成甲 (1)
“观其所藏, 知其所养”	
——谈《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	丁磐石 (13)
土地改革中没收和分配土地问题·····	杜 敬 (23)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燕 凌 (52)
失败者的探索	
——1913—1915 年间关于中国如何实现民主	
政治的讨论·····	徐宗勉 (82)
清代的科目选士与竞争机制·····	宋元强 (109)
双陆与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宋德金 (126)
论扫盲的战略地位与中国的扫盲战略·····	李克敬 (144)
火历钩沉	
——一个遗失已久的古历之发现·····	庞 朴 (169)
弱嵌入性与女性研究	
——《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代序·····	孟宪范 (204)
我国生产资料流通模式的转换·····	秦 毅 (227)
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	
——兼论“谁投资, 谁所有”原则·····	晓 亮 (243)
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公有制理论的几点体会·····	傅军胜 (251)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对外开放: 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赵振英 (261)
也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何祚榕 (272)
《孙子兵法》时代特征考辨·····	蓝永蔚 (279)

# 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

朱成甲

辛亥革命以后，如何认识和对待袁世凯，是当时中国人民所面临的最尖锐、最复杂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严峻地教育和锻炼了中国人民，使他们加深了对于中国封建传统和封建势力的认识，提高民主主义的思想觉悟与政治水平。从而，把处于困境的中国民主革命继续向前推进。

辛亥革命后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和态度，是研究李大钊早期思想所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只有实事求是地弄清这个问题，才能比较确切地理解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发展过程；同时亦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中国民主革命的某些特点。本文拟就此发表一点粗浅的意见，以期引起研究者的进一步探讨。

## 一

李大钊对于袁世凯反动面目的彻底认识是否有一个过程？有的同志认为，在辛亥革命后，李大钊“以敏锐的洞察力很快就看出了袁世凯军阀统治的专制实质”，他的《大哀篇》就是“对袁世凯专制统治最早的也是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sup>①</sup>有的同志认为，李大钊写《国情》一文，“看透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表现了“政治上深刻的远见”。<sup>②</sup>也有的同志认为，在袁世凯与日寇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时，李大钊就“积极进行反袁活

---

<sup>①</sup> 戴鹿鸣：《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李大钊——李大钊从急进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集，第104页。

<sup>②</sup> 《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页。



动”，“公开举起反袁的旗帜”，“系统地揭露了袁世凯卖国及日寇侵华的罪行”。<sup>①</sup> 这些看法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呢？我觉得很需要重新探讨。

李大钊在《大哀篇》中虽然对国家命运无比关心，对地方都督无情揭露，对各类政党痛加鞭挞，但对居于合法地位的国家元首袁世凯的反动面目却还未认识清楚。李大钊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势凌夷，民生不堪，从远因说，是几千年封建专制造成的；从近因说，则是各个政党争权攘利和地方都督专横造成的。

对于当时的各类政党，李大钊说：“实则所谓稳健者，狡狴万恶之官僚也，急进者，蛮横躁妄之暴徒也，而折衷者，则又将伺二者之隙以与鸡鹜争食者也。”他认为，这些政党尽管宣传党纲的时候都说自己掌权能“强吾国而福吾民”。但实际上“以言党德，有一得志，吾国必亡，吾民无噍类矣”。<sup>②</sup> 但是，李大钊这种深刻的揭露却不能认为是针对袁世凯的，因为当时的袁世凯不属于他所指的任何一个党派。<sup>③</sup> 按照李大钊和时人的一般看法，民党属激进系统，进步党属温和系统，而所谓“折衷者”则是指上述二者之外的一些小党，如统一共和党等。<sup>④</sup>

反对地方都督专横，在李大钊早期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指出，这些都督“坐拥重兵，有恃无恐，上可以抗中央，下可以胁人民”，使“中央视之无奈何也，人民视之无奈何也”。<sup>⑤</sup> 这种“专制都督之淫威，乃倍于畴昔之君主”<sup>⑥</sup>。李大钊对于都督的抨击能否认为是针对袁世凯的呢？也不能。因为对于袁世凯当时不存在“上可以抗中央”的问题。李大钊这时虽然对袁世凯统治下的黑暗现实不满，但他却没有明确认识到民国大总统与地方专制都督之间的内在联系，没有认识到袁世凯是当时中国祸乱的主要根源之一。

① 陈善学：《论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和陈独秀》，《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集，第165页。

② 《李大钊选集》，第1—2页。

③ 袁世凯在《致柏文蔚论政见》中说：“至加入党籍，上年中山克强诸公，亦曾力劝。惟因人甲党，则乙党为敌，人乙党则丙党为敌，实不敢以一己之便安，而起中国之纷扰。”他声称：“以中华民国为党”，“俟将来政党真正稳固，或不能终守不党主义，今则尚非其时也”。因此，袁世凯当时不属任何一个党派。引文见《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五《函牍》。

④ 参见《中心势力创造论》，《甲寅》1917年4月23日。

⑤ 《李大钊选集》，第2页。

⑥ 同上。

主要矛头反“藩镇”、不反袁氏为代表的中央，是李大钊这时认识上的重要倾向。这种倾向，在1913年6月《裁都督横议》中进一步表现出来。文章说：“秘观天下大势，中央命令何以不行？地方乱机何以不戢？民生幸福何以不享？财政之紊何以不清？吏治之颓何以不振？神州郁塞，憔悴斯民，萁豆相煎，操戈同室，推原探本，何莫都督为之梗也。”<sup>①</sup>李大钊提出裁都督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为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文章驳斥一些人为反对袁世凯专制而提出的“地方分权之谬说”，主张“中央收回军政实权”、“大权一揽之中央”，认为这样“则以后措置裕如”。裁了都督，可以消除“割据之局，拔本塞源，固统一之基”。<sup>②</sup>文章特别指出：“政府北迁而后，号称统一，实则虚与委蛇”，“江南各省，远在南服，中央之威信不灵，内外之猜嫌纷启。皖赣湘粤，傲岸自雄，不待宋案发生，借款事起，始有离异之迹”。对于“抗不解兵，叛逆已著”的都督，就应该“挞伐宜速”，“雷厉风行，不少宽假”。<sup>③</sup>文章对于指摘袁世凯违宪之说，认为：“今人不察，徒断断于中央之是防，而不知跳梁违宪者，实不在总统，而在都督也。”<sup>④</sup>李大钊明确指出：“中央非专制之局”。<sup>⑤</sup>李大钊的这些观点和主张，充分说明他当时并没有认识袁世凯“军阀统治的专制实质”。他由一般地反对都督专横，到明确地反对“皖赣湘粤”四省的都督；由一般地维护中央的集中统一，到明确地维护以总统袁世凯为首的集中统一，其思想倾向是很清楚的。他当时并没有认清袁世凯的罪恶阴谋。

与《裁都督横议》同时发表的《论民权之旁落》，同样存在着对袁世凯的模糊认识，以至有为他开脱辩护之词。辛亥革命以后，民权旁落是客观事实。而李大钊对于民权旁落的议论，主要矛头并不是反袁的。他认为：“黎庶之患，不患无护权之政制，患在无享权之能力；不患无为之争权的人，患在为之争权者转而为窃权之人。”<sup>⑥</sup>这里所说的，“争权之人”与“窃权之人”，指的是一些革命党人而不是袁世凯。也就是说，李大钊当时并不认为袁世凯是窃权之人，是使民权旁落的祸首。文章对当时种种

① 《言治》月刊第一年（1913年）第3期。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防袁的论调和措施表示“不能无疑”，并且提出：“防北京军警干政者吾闻之矣，防各省都督跋扈者未之闻也；各省议会多数于异党都督而为攻讦者吾闻之矣，于同党都督而为救正者未之闻也；防总统政府专制者吾闻之矣，防议会专制者未之闻也；虑中央集权启政府专制之患者吾闻之矣，虑地方分权召国家分崩之祸者未之闻也。”<sup>①</sup>显然，这些言论在当时是对袁世凯有利的。

为了解决民权旁落的问题，李大钊主张用教育提高民德民力。他认为民权旁落的原因在于民“无享权之能力”，希望在野的革命党人完成此项任务。他说：“所望仁人君子，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争夺政权之魂力，以从事于国民教育，十年而后，其效可观，民力既厚，权自归焉。不劳尔辈先觉君子拔剑击柱为吾民争权于今日。不此之图，纵白喙以夸功于吾民之前，吾民不尔感也！”<sup>②</sup>有的同志认为，李大钊“这时的文章中指出，阴谋盗窃民权的袁世凯是暗杀宋教仁的元凶，而‘暗杀’与‘借款’，更造成了祖国‘危机万状’，民权‘旁落’、‘民生益沦于涂炭’”<sup>③</sup>。这是不符合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实际的。李大钊悲愤地谈到遁初之死，但他只是一般地反对当时流行的暗杀手段<sup>④</sup>，而对于这一事件的真正责任却没有明确的认识。

1914年11月写作的《国情》一文是李大钊思想转向反袁的重要标志。文章主要驳斥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贺长雄与古德诺反对中国实行共和的谬论，由于直接指向袁世凯的“客卿”，对于袁的复辟阴谋不能不是沉重的打击。因此，说《国情》一文是“反袁的先声”<sup>⑤</sup>，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是，从《国情》的整个内容来看，李大钊也还没有认清袁世凯与两个“客卿”的关系。他的“国情之不可谋与客卿”之说，实际上是把袁世凯与古德诺等人分开，希望袁世凯自定主见，拒绝古德诺等客卿复辟帝制的谬论。他没有认识到“客卿”的谬论正是为袁世凯阴谋称帝服务的。

袁世凯在正式称帝之前，无限制地扩大自己的权力。为了制造法律依据，1914年3月他成立约法会议，以修改孙中山所定的《临时约法》。袁

① 《言治》月刊第一年（1913年）第3期。

② 同上。

③ 《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页。

④ 参见李大钊《原杀——暗杀与自杀》，《言治》月刊第一年（1913年）第4期。

⑤ 许德珩：《纪念伟大的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7日。

世凯在这次会议上指摘《临时约法》“束缚政府”，使政府“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使本大总统“身受其痛苦”；<sup>①</sup>“约法上行政首长之职任不完，则事实上总揽政务之统一无望”；“临时约法限制过苛，因而前参议员干涉太甚”；<sup>②</sup>从而要求进一步扩大总统职权。按照袁世凯的意志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其核心是“总揽统治权属于国家元首，以重大总统之权”。<sup>③</sup>这个“约法”，废除了国务院，设立政事堂，使名义上的内阁制也宣告解体，袁世凯事实上则成了惟我独尊的皇帝总统。古德诺的《新约法论》和贺长雄倡总统内阁制说，正是配合了袁世凯的复辟步骤。袁世凯的这一阴谋，当时即遭到一些革命党人的猛烈抨击。李大钊在《国情》中虽然旗帜鲜明地坚持民主共和的立场，但对新约法问题则取慎重的观察态度。他说：“古德诺所论是否谐理，姑不置论。以新约法为物，无吾侪管窥法理之余地。”这说明李大钊当时对袁世凯与“客卿”之间互相配合、狼狈为奸、加紧复辟的阴谋还没有完全认识。

《国民之薪胆》、《警告全国父老书》反映李大钊爱国思想和民主思想的新发展，特别是对于袁世凯的反动面目有了一定的认识。他明确地指出袁世凯有“复古之非，弃民之失”，对此采取了明确的批评和督励的态度。但是，由于当时形势复杂，为了一致对外，李大钊文章的主要锋芒是针对日本政府的侵略阴谋而不是袁世凯的卖国罪行。

李大钊大声疾呼地警告国人“二十一条”的侵略实质和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危机，“对于吾国，则断绝根本复兴之生机，毁灭国家独立之体面，使我永无自存图强之实力”<sup>④</sup>。所以，他表示“切齿国仇”的决心，誓为反抗这种侵略而献出“丹心碧血”。

对于袁世凯政府当时的做法，李大钊认为是出于迫不得已的。他说：“我政府勉顾邦交，再三隐忍，不得已而划交战区域”，以期对日本“稍有所限制”。<sup>⑤</sup>他认为，全国人民的态度应该一方面“督励政府”，使之“秉国民之公意”，“为最后之决行”；另一方面则应“策政府之后，以为之盾”，

① 《约法会议开会颂词》，《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文辞》。

② 《致众议院咨请增修约法案文》，《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1《咨文》。

③ 转引自《大中华民国史》，第340页。

④ 《李大钊选集》，第16页。

⑤ 同上书，第22、27、17页。

“决勿许外敌以虚喝之声，愚弄之策，诱迫我政府，以徇其请”。<sup>①</sup>他警告：“政府果不愿为亡国之政府，则宜及早觉悟其复古之非，弃民之失，速与天下更始。”<sup>②</sup>由此可见，李大钊这时并没有“系统地揭露了袁世凯卖国”并“公开举起反袁的旗帜”。在《国民之薪胆》中明确地说，他之写作此文就是“欲促政府之反省，奋国民之努力而已”<sup>③</sup>。因此我以为，李大钊这时的态度是“促袁救国”、“逼袁救国”而不是“反袁救国”、“倒袁救国”。

李大钊究竟什么时候才彻底认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从现有的材料看，我认为是在写作《国民之薪胆》以后。随着袁世凯的卖国面目的急剧暴露及其复辟帝制活动的日益公开，李大钊的认识也迅速有了新发展。1915年下半年，李大钊由于认清袁贼的反动面目而决意公开反袁。1916年初，李大钊毅然由日返沪策划反袁斗争。他愤怒写出“八表正同昏，一夫终窃国”<sup>④</sup>的著名诗句。不久，又编辑出版了《民彝》并发表了《民彝与政治》，明确指出袁世凯“大盗窃国”。文章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系统地批判袁世凯的复辟罪行，深刻地阐述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和原则。这时，李大钊的民主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 二

李大钊对于袁世凯认识的曲折过程，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一时期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反映这一时期中国民主革命的某些特点、缺点和弱点，反映这一时期国人的心理与思想政治水平。

辛亥革命后不久，李大钊即赴日留学。他的反袁活动，基本上是在留日学生中进行的。1916年全国讨袁时，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曾发表讨袁宣言，从中很可以看出李大钊当时对于袁世凯认识的历史背景以及发展变化的原因。

辛亥革命以后，人们是怎样看待袁世凯的？宣言说：在“民国肇造、险阻艰难”之时，“国民以开创之大任，托付于今日总统袁世凯君”。<sup>⑤</sup>由

① 《李大钊选集》，第22、27、17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14页。

④ 《李大钊诗文选集》，第18页。

⑤ 转引自黄毅编述：《袁氏盗国记》（下），上海国民书社印行，1916年9月第2版，第49—50页。

于人们“望治情殷，厌乱心切”，因而对于袁世凯施政中即使“稍逾轨范”，也都“隐忍受之而无怨诽，凡以示国民寄托之重、信赖之诚也”。<sup>①</sup>由于内忧外患的日趋严重，“政乱如麻，万端待理”，因此，“国民私心窃祝，冀有大刀阔斧之政治家，出而运其刚毅敏断之手腕”。<sup>②</sup>我们从《大哀篇》、《隐忧篇》、《裁都督横议》等可以明显地看到李大钊当时同样的态度和心情。宣言接着沉痛地说：“何图斯世之雄，窥见国民心理之所向，而思有以利用之，以遂其私”；以至“陈桥并无兵变，黄袍自欲加身”。<sup>③</sup>

宣言关于“二十一条”传出后情况的阐述和李大钊的《国民之薪胆》、《警告全国父老书》又是完全一致。宣言说，惊悉“二十一条”以后，“吾侪旅学日本，亦尝西遣代表，陈辞都门，呼吁海上，冀从父老之后，聊厚政府之援。当局苟不弃民，正宜利此机会，唤起举国一致之精神，消泯内部阂墙之宿隙，从兹改革内政，无诈无虞，宁非一国前途之幸？”但袁氏“犹不知深自引咎，口血未干，妄念又炽”，终至“倾覆共和，恢复帝制”。<sup>④</sup>因此庄严宣布袁贼为“叛国”，而“决意反对”。<sup>⑤</sup>

李大钊的认识不仅和相当数量的留日学生一致，而且也反映当时国人的心理和认识过程。孙中山对此曾有很好的描述。他说，袁氏窃权后“既挟金钱势力，肆用诈术，而劣迹未彰，国人鲜语”，所以才有二次革命的失败。而在二次革命失败以后，“群思持重，缓进之说，十人而五。还视国中，则犹有信赖袁氏而策其后效者；有以为其锋不可犯，势惟与之委蛇而徐图补救者；有但幸目前之和平，而不欲有决裂之举者。文以为此皆有所执持，而其心理上之弱点，则袁氏皆得而利用之，以逞其欲。”<sup>⑥</sup>

由于袁世凯“肆用诈术”，在一定时期“劣迹未彰”，国人难以认清他的面目，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在几千年封建帝制刚被推翻以后，人们心理上存在种种严重的弱点以致为袁世凯所利用，这也是客观事实。就心理的弱点来说，辛亥革命以后突出表现为“厌乱”和“依赖”。“厌乱”思想，使人们害怕革命风暴，

① 转引自黄毅编述：《袁氏盗国记》（下），上海国民书社印行，1916年9月第2版，第49—50页。

② 同上书，第51—52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00—101页。

害怕彻底的革命变革，不愿对封建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只求实现形式的统一、和平。它实质上反映人们妥协苟安的心理，以致在一场革命刚刚开始时就要求匆匆忙忙地结束革命。“依赖”思想则表现为把国家治乱、民族安危、个人祸福寄托于个别“天威神武”的英雄身上，而把自己置于被治者的地位，置于政治生活之外。这些思想，正是袁世凯窃国复辟的重要条件。

李大钊早期的民主思想，固然有许多长处，但也不能摆脱整个国民心理的影响。在《大哀篇》中，李大钊虽然看到人民的痛苦，但却找不到解除这种痛苦的途径、方法，只能把一切寄托于“善治者”身上，希望“善治者”出来做救世主，解民倒悬。在《论民权之旁落》一文中，李大钊认为中国人民当时之“普通程度，决不足以图共和之治”，还“不能受其权”，因此，“其权必归于旁落”，为“强有力者所袭取”。他认为，当时“方风驰云扰之会，所以震伏群魔，收拾残局者，固不得不惟此枭雄是赖”。在《隐忧篇》和《裁都督横议》文中都可以看到李大钊“望治情殷”与“厌乱心切”。而当时为了求治弭乱，最简单最省事的办法就是维护袁世凯为首的集中统一。正是由于这种心理，李大钊才不加分析地反对乱，包括反对1913年的讨袁战争，把反袁的革命党人称为“暴党”。

除受到社会上国民心理影响外，李大钊所在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对他亦有一定的影响。该校北洋法政学会主办的刊物《言治》，当时的基本政治倾向是拥护袁世凯的，是为袁世凯寻求为治之道的。1913年李大钊共发表22篇文章，都是刊登在《言治》上的。文中虽然也有一些可贵的民主思想，但总的来看革命锋芒不足，思想受到很大束缚。他主要是在探讨一些比较表面的枝叶问题，而不是民主革命中的根本问题。而当他离开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到日本留学以后，思想倾向即迅速起了变化。1914年李大钊发表的《政治抵抗力之养成》，主调已和《大哀篇》大不相同。《大哀篇》哀叹“吾民委无望矣”，而《政治抵抗力之养成》则认为：“群众势力，有如日中天之势，无敢悔者。”英雄人物，也无非是“群众意志之积累”。<sup>①</sup>在差不多同时发表的《国情》一文，则已明显地表现出他在思想上倾向反袁。

李大钊从爱国的热忱出发，拥护袁世凯为首的集中统一，反对当时革命党的反袁斗争，说明这时他在政治上缺少经验，民主思想不成熟。

辛亥革命打破了几千年旧的封建统一，如何建立新国家，是当时全国

<sup>①</sup> 《中华杂志》1914年第1卷第1号。

人民最关心的迫切问题。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大国，统一正是它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维护和珍视国家的统一，是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传统。面对辛亥革命以后的形势，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提出要实现“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并以此作为“政务之方针”。<sup>①</sup>孙中山提出的统一方针，具体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与人民的愿望。但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孙中山既无实现统一的力量，也无保证实现统一的措施。他只好用向袁世凯让权的方式，去实现所谓的和平统一。

袁世凯窃国过程中，统一成为他的重要旗号。他在致黎元洪信中说：“连日与孙、黄二君商榷内政进行方针，由凯开出大纲八条”，而第一条就是“立国取统一制度”。<sup>②</sup>为了统一，他要求各政党（当然主要是革命党）“牺牲其政策”；<sup>③</sup>要求法律承认他个人高度集权，声言否则“则事实上总揽政务之统一无望”；<sup>④</sup>强令尊孔，一切以孔子教义为准绳，“以正人心，以立民极”，“统于一尊”。<sup>⑤</sup>袁世凯对于二次革命的镇压，其理由就是：“少数暴民，破坏统一，倾覆国家……余为救国救民计，不得已而用兵。”<sup>⑥</sup>他在回顾自己的“政绩”时说：“临时政府一年以来，无日不以恢复秩序，力谋统一为事。盖非此无以靖地方、亦非此无以立国也。”<sup>⑦</sup>他再次声称：“政府撤换数人（按：指免去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的都督职务），正为一致进行，早得统一起见。”<sup>⑧</sup>李大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袁氏所惑。

统一，的确是伟大的口号和伟大的事业，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也的确需要统一；但这种统一，应是民主的统一、革命的统一，而不是封建的统一、反革命的统一。袁世凯所谓的统一，虽然字面上和孙中山说的完全一样，但内容实质上却有根本区别。在孙中山关于统一的言论中，绝没有以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来统一全国人民思想和实行个人独裁的内容。舍开其他问题不说，仅就这两点，就已经暴露了袁世凯复辟倒退的反动本质。李大钊当时以

① 《孙中山选集》上册，第82—83页。

② 《致黎副总统商榷大政方针》，《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5《函牍》。

③ 转引自白蕉编著《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7页。

④ 《致众议院咨请增修约法案文》，《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1《咨文》。

⑤ 《通令尊崇孔圣文》，《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2《政令》。

⑥ 《莅任正式大总统宣言》，《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文辞》。

⑦ 《通告各国公使书》，《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5《函牍》。

⑧ 同上。



抽象的统一、抽象的国家作为“衡量事理之器”与“为治”、“求治”的最高政治原则，而不能以民主的原则、革命的原则对国家、对统一进行具体分析和鉴别。这是他早期民主思想上的弱点，说明他在政治上还不成熟。

中国民主革命是在特殊的国度、特殊的时代条件下进行的。软弱的资产阶级既不能造成这场革命胜利的物质条件，也不能造成这场革命胜利的精神条件。无论在这场革命的酝酿时期还是在发动时期，民主共和的理论都没有真正为群众所掌握。落后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造成的狭隘眼界，使它在思想理论上极为幼稚浅薄。过分的种族革命的宣传，浓厚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色彩，往往冲淡、湮没甚至歪曲民主主义的真正任务和目标，妨碍人们对它的精神实质作更为深刻的理解和阐述。资产阶级的这种思想上的弱点，辛亥革命后在国家、统一、集中等问题上都充分地暴露了出来。资产阶级革命派根本无力回答和解决政治领域中这些重大的复杂问题，无力在这些问题上战胜强大的封建主义。其中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恰恰为袁世凯所歪曲和利用。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前导——四川保路运动——的郭沫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那时的少年人大都是一些国家主义者，他们有极浓重的民族感情，极葱茏的富国强兵的祈愿，而又有极幼稚的自我陶醉。他们以为只要头上的豚尾一剪，把那原始的黄色大龙旗一换，把非汉族的清政府一推倒，中国就可以立地成为‘醒狮’……”<sup>①</sup>至于究竟要怎样富国强兵，人们的认识是朦胧的。我们考察李大钊的早期民主思想，不能不说他也同样属于这种情况。

中国民主革命是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下进行的。这种危机固然对革命起到促进作用，但也使这种革命遇到更大的困难，益增其复杂性。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围绕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首要任务，各种力量不断地进行分化、组合和斗争。李大钊的早期思想，也受到这种历史特点的影响和制约。

如前所述，李大钊到日本留学后对袁世凯的认识是有新发展的。如果沿着《国情》一文的思路继续前进，他将很快地认清袁世凯的窃国阴谋。但事实上他的思路却为1915年初传出的“二十一条”问题所打断，他的注意力几乎完全转移到反对日本侵略方面，而放松以至中断国内的反封建斗争。由此可见，在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外反侵略与内反国贼的关系，并非简单容易。

<sup>①</sup> 《沫若文集》第6卷，第271页。